

跨文化交际教学与课程思政的融合机制及实践路径研究

刘娜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东莞, 中国

【摘要】在全球化和“课程思政”背景下,传统跨文化交际教学面临价值引领不足与中西话语失衡等问题。本文探讨二者融合路径,提出以“价值引领”推动三大教学转向:从文化差异认知转向价值辨析,从中西失衡转向平等互鉴,从价值中立转向文化自信。据此构建“能力重构”框架,涵盖“价值-知识-案例”三维内容、“情境-反思-行动”三阶模式及过程性与多维结合的评价机制,旨在培养兼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与文化自信的高素质人才。

【关键词】课程思政;跨文化交际;教学改革;价值引领;文化自信

【基金项目】2025-2026 学年校级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项目编号:2025yjg060);东莞城市学院教材建设项目(项目编号2025jc009)

1. 引言

在全球化纵深发展与新时代人才战略的双重驱动下,培养兼具卓越跨文化沟通能力与坚定文化自信的高素质人才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使命。跨文化交际课程作为培养学生跨文化理解与实践能力的核心载体,其教学质量和育人成效直接关系到国家软实力建设和国际话语权提升。然而,传统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普遍存在“重技能传授、轻价值引导”的倾向,过于聚焦西方理论引介和工具性知识灌输,未能将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教学体系,导致学生在面对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和意识形态博弈时,往往缺乏必要的价值判断力和文化主体意识。

近年来,随着“课程思政”教育理念的全面推进,如何实现专业知识传授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成为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课题。现有研究虽已关注到课程思政与外语类课程的结合,但针对跨文化交际这一特定领域的探讨仍显不足:或停留于宏观理念阐述,缺乏可操作的整合路径;或局限于零散案例分享,未形成系统化的教学改革方案。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层,制约了跨文化交际教学育人功能的充分发挥。

鉴于此,本研究立足于课程思政视域,致力于构建一套系统化、可实施的跨文化交际教学改革框架。通过深入剖析课程思政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在契合性,明确“价值引领”的核心理念,进而从教学内容重构、教学方法创新和评价体系改革三个维度提出具体实施方案,以促进知识传授、能力培养

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跨文化交际教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指南。

2. 理论框架:课程思政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契合点

实现课程思政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深度融合,首要前提是在理论层面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找到坚实的学理支撑。这要求我们超越对课程思政的片面理解,并深化对跨文化交际能力本质的认识。价值引领是推动教学改革的关键。

2.1 课程思政的深层内涵:超越知识传授的价值引领

课程思政的本质绝非在专业课上简单添加政治说教,其精髓在于“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落实。它强调教育的全过程育人功能,追求的是“如盐在水”般的价值引领效果[1]。这意味着,价值塑造并非外在于专业知识,而是渗透并引领着知识传授与能力培养的方向。具体而言,它旨在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过程,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其在掌握专业本领的同时,能够明辨是非、恪守伦理、心怀家国。这种引领作用在涉及不同文化价值观念碰撞的跨文化交际领域显得尤为重要。

2.2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核心维度:从技能到素养的升华

传统教学有时将跨文化交际能力简化为一系列可操作的工具性技能,如避免文化禁忌、运用得体礼仪等。然而,根据迈克尔·拜拉姆等学者的理论,一个完整的跨文

化交际能力模型应包含知识、技能、态度与批判性文化意识等多个维度。跨文化能力培养应成为外语学科立德树人和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抓手，其深层维度涵盖“跨文化认知理解、跨文化意识、跨文化情感态度、跨文化身份认同、跨文化思辨和交际技能”，这为从“技能”到“素养”的升华提供了更为系统的学科阐释[2]。其中，态度维度，如开放性、好奇心以及对不同文化成员的尊重与包容，直接关乎学习者的情感倾向与价值立场。而批判性文化意识则被视为最高层次的能力，它要求学习者能够依据明确的评判标准，对自身及他者的文化观念、实践与产品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和理解。这一维度恰恰与课程思政所强调的价值判断与批判性思维培养高度同构。

2.3 语言意识形态：连接话语实践与价值判断的桥梁

将二者深度融合的理论桥梁在于对语言意识形态的洞察。语言并非价值中立的交际工具，它承载并建构着特定的文化观念、社会规范与权力关系。跨文化交际实践，本质上是一种涉及意识形态与话语建构的社会行为。例如，在分析中西方的沟通风格差异时，其背后往往隐含着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等深层文化价值观念的对立与交融。课程思政的融入，正是要求我们的教学不能止步于让学生成为“文化差异的识别器”，更要引导他们运用批判性思维，探究语言交际背后隐藏的意识形态因素，理解其生成的社会历史语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价值判断。这便实现了从“文化差异认知”到“文化价值批判与建构”的范式转换，使得跨文化交际课程自然成为塑造学生文化主体性与价值判断力的核心场域[3]。

3. 现状审视：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面临的挑战

尽管课程思政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已形成广泛共识，但在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具体教学实践中，其有效融入仍面临诸多现实困境与挑战。这些挑战根植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最终的教学效果等多个层面，构成了阻碍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深度融合的屏障。

3.1 教学内容选取的失衡与文化深度的缺失

当前，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内容体系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失衡。大量广泛采用的经

典教材与教学资源，其理论框架与案例库在很大程度上仍建立在以西方文化为中心的知识体系之上。例如，霍夫斯泰德的文化维度理论、霍尔的高低语境文化理论等西方学者提出的模型，往往构成了课程的理论基石，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交往伦理、当代中国倡导的“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所蕴含的跨文化智慧，则缺乏系统性的梳理与融入。这种内容上的偏重，容易在无形中向学生传递一种单向度的文化视角，即默认西方理论是普世的标尺，而本土文化实践则成为被审视和测量的对象。其后果是，学生可能对西方文化概念如数家珍，却难以运用国际社会能够理解的话语体系，来清晰、自信地阐释中国文化的内核与当代中国的价值主张，文化自信的根基因此难以夯实。当前跨文化交际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以及其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独特贡献”，这进一步印证了教学内容失衡与文化深度缺失的普遍性问题[4]。

3.2 教学方法的形式化与批判性引导的不足

在教学方法层面，存在着将复杂文化学习简单化为知识记忆与行为模仿的倾向。许多课堂活动设计停留在对文化现象的表层对比和交际技巧的机械操练上。例如，满足于让学生罗列中美在时间观念、表达方式或社交距离上的差异，或是模拟如何与外国人进行一场“符合规范”的商务会谈或社交寒暄。这类训练虽具一定基础价值，但若缺乏教师深度的、引导性的追问与批判性质疑，便难以激发学生探究文化差异背后的历史渊源、社会结构与哲学根基。教学停留在“知其然”的层面，而疏于引导“知其所以然”，更无力引导学生应对真实跨文化场景中日益常见的价值观冲突、话语权博弈以及意识形态偏见等复杂情境。这种教学方法上的浅表化，使得课程思政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与价值判断能力的培养，失去了赖以生长的土壤。当前跨文化交际教学往往忽视“跨文化沟通的复杂性和政治性”，停留在“较低层次的日常生活交际”，难以应对涉及价值观冲突与国家利益的复杂情境[5]。

3.3 学习效果的局限性与主体性建构的薄弱

上述教学内容与方法的局限，最终体现在学生的学习效果上，表现为其文化主体性与价值建构能力的相对薄弱。经过课程学习，学生或许能够熟练地识别和描述不同文

化的表征差异，甚至掌握一些应对策略，但在面对涉及中外价值观深刻分歧的现实议题时，其思维往往容易陷入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陷阱。例如，在讨论个体与集体关系时，可能简单地将个人主义等同于“先进”与“自由”，而将集体主义等同于“落后”与“束缚”，缺乏辩证分析的视角与能力。他们要么可能不假思索地全盘接受他者的文化标准，要么则固守于一种本能的文化防御姿态，难以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平等的跨文化对话，更无法在对话中有效传递中国声音、展现中国智慧。这种在复杂情境中运用批判思维进行独立价值判断、坚守文化立场并有效沟通的能力不足，恰恰凸显了当前教学中价值引领层面亟待加强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4. 能力重构：教学改革的具体路径与实践策略

理论层面的耦合性与核心理念的明确，最终需通过具体、系统的教学改革路径付诸实践。本章围绕“能力重构”这一目标，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评价体系三个关键维度，构建一个相互支撑、协同作用的改革框架，旨在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学生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全面提升与深化。

4.1 教学内容的重构：构建“价值-知识-案例”三维矩阵

教学内容的革新是改革的基础。为打破传统教材中以文化事实罗列和西方理论为主导的线性结构，我们提出构建一个“价值-知识-案例”三维融合的教学内容矩阵。在价值维度，教师需在每一教学单元伊始，明确本单元旨在渗透和培养的核心价值观或思政要点，例如在“非语言交际”单元强调“尊重与包容”，在“文化价值观比较”单元聚焦“平等与公正”，在“跨文化冲突管理”单元突出“和谐与协作”。在知识维度，则系统整合跨文化交际的基础理论、核心概念与中外文化知识，特别注重补充关于当代中国国情、发展模式与文化创新成果的内容，确保知识体系的完整性与时代性。在此过程中，可借鉴“宏观理论与微观理论有机融合”的思路，既引入文化维度、高低语境等宏观分析框架，也深入挖掘如“和而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的微观文化表达，形成层次分明、中外互鉴的知识体系，避免理论教学的扁平化与西方中心倾向[6]。在案例维度，精心遴选或开发那些能够

承载价值冲突、引发深度思辨的真实情境案例，例如分析跨国企业并购中的文化整合伦理困境、解读国际媒体涉华报道中的话语策略与意识形态偏见、或探讨“一带一路”项目中中外员工协作的成功经验。通过这三个维度的有机交织，使每一次知识传授都能在具体情境中引发价值思考，每一个案例剖析都能有坚实的理论与价值支撑。这一重构过程可借鉴“全球-国家-地方”内容整合路径，即在案例设计中既要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全球议题，也要贯穿核心价值观等国家叙事，还应挖掘地方文化资源作为生动教学素材，实现思政内容在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有机贯通[7]。

4.2 教学方法的创新：推行“情境-反思-行动”混合式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的创新是确保改革落地的关键。为改变以教师讲授为主的单向模式，我们倡导推行“情境-反思-行动”三阶递进的混合式教学模式。情境创设是起点，利用高质量的影视片段、精细设计的角色扮演任务、基于真实事件的模拟谈判或虚拟仿真项目，将学生置于高度仿真的、蕴含价值张力的跨文化道德困境之中，激发其内在的学习动机与情感体验。例如，在法语教学中设计的“中法家庭聚会”情境模拟，以及利用AI口语模拟软件生成对话视频的做法，为本研究的情境创设提供了可操作的范例[8]。教师可借鉴此类“技术赋能路径”，将AI虚拟伙伴、多模态资源融入情境设计，使学生在模拟互动中不仅训练语言，更体验文化差异与价值冲突，为后续的反思与行动奠定基础。引导反思是核心环节，在学生沉浸于情境之后，教师通过苏格拉底提问法、结构化的小组讨论或撰写反思日志等方式，提出一系列引导性问题，例如“在此情境中，各方的行为背后体现了何种文化价值观？”“如果你是当事人，基于你所认同的价值观，会做出何种选择？理由是什么？”，促使学生连接价值维度与知识维度，进行批判性思考与价值辨析。行动导向是最终产出，要求学生将反思所得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成果，例如针对某一文化误解设计一份公共外交倡议书、为一个旨在促进中外学生文化交流的项目制定实施方案、或创作一个能够展现真实、立体、全面中国形象的短视频。这一模式实现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建构，从知识内化到能力外化的完整学习闭环。

4.3 评价体系的改革：建立过程性与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机制

为确保教学改革的有效性并发挥“指挥棒”的正向引导作用，必须对评价体系进行同步改革，建立一套侧重于过程性、多维度的综合评价机制。首先，需显著降低期末一次性笔试在总评成绩中的权重，转而增加贯穿整个学习过程的形成性评价占比。其次，评价内容应超越对文化事实记忆和沟通技巧复现的考查，全面覆盖学生的认知、能力与价值三个层面。具体而言，认知层面可通过学术小论文、文献评述等方式，考查学生对理论的理解深度及其与文化现象关联的能力；能力层面则通过观察其在模拟活动、项目实践中的表现，评估其策略运用、团队协作与问题解决的实际效能；价值层面是最为核心且具挑战性的，需通过深度分析学生的反思报告、课堂发言中的价值表述、以及在案例讨论中所展现出的文化立场与伦理判断，来综合评价其跨文化批判意识、家国情怀与文化自信的建立程度。这种多元、立体的评价体系，不仅更能真实地反映学生的综合素养，也通过其导向作用，激励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持续投入于深度思考与价值建构。

5. 可能面临的挑战与应对建议

任何教学改革的推进都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将上述理论框架与路径付诸实践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诸多现实层面的挑战。预先识别这些潜在障碍并思考应对之策，是确保改革得以顺利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的重要保障。本章将着重分析三大核心挑战，并提出相应的初步解决方案。

5.1 思政与专业“两张皮”的融合难题

最深层次的挑战在于，如何避免课程思政与跨文化交际专业知识成为相互割裂的“两张皮”，即生硬嫁接、牵强附会，导致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相互脱节甚至相互削弱。若处理不当，不仅无法实现育人目标，还可能引起学生的抵触情绪。应对这一挑战，关键在于提升教师的融合设计能力。教师自身必须深入理解课程思政不是额外增加的教学内容，而是一种内化于教学全过程的育人理念。建议通过组织跨学科的教学工作坊和集体备课会，汇聚语言学、传播学、国际关系等领域的教师，共同挖掘跨文化交际课程中内生的、自然的思政元素与融合点。例如，从“文化维度理论”本身就可以引申

出对文化相对性与普遍性的哲学思考，而非在讲完理论后额外附加一段思政说教。成功的融合应如“盐溶于水”，虽不见形迹却能品其滋味，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无痕地接受价值熏陶。

5.2 教师思政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的挑战

改革的具体执行者——教师，是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目前，部分专业教师可能存在对课程思政理念理解不深、自身思政理论素养有待提升、或缺乏将价值观融入专业教学的有效方法与信心等问题。这直接影响了教学改革的深度与质量。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教师还面临“人工智能素养”提升的新挑战。外语教师需在认知与实践层面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既要“正确认识并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不同形式的应用”，也要通过“人机协同与互补”创新教学设计与评价[9]。因此，教师发展体系应纳入人工智能素养培训，帮助教师将AI作为“具有一定独立意识的‘语伴’”融入跨文化教学，从而在技术融合中深化价值引领，实现“新外语”育人目标。为此，必须构建系统化、常态化的教师发展支持体系。高校教学发展中心应牵头组织专门的培训项目，内容不仅包括课程思政的政策解读与理论内涵，更应侧重于提供丰富的、可借鉴的跨文化教学融合案例与教学设计方法[10]。同时，积极推动建立“传帮带”机制，鼓励经验丰富的教师与青年教师结成对子，共同开展教学研究。此外，组建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团队，通过集体研讨、相互听课、教学反思等方式，形成合作共进的教师学习共同体，在实践中持续提升每一位教师的融合教学能力。

5.3 教学效果评价的量化困境

对融合了价值引领的教学效果进行科学、有效的评价，是另一个显著挑战。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文化立场与批判性思维能力的提升，是内隐且长期的过程，难以通过传统的标准化考试进行精确量化[11]。若评价方式不当，极易流于形式，无法真实反映改革的成效。应对此困境，必须坚持定量与定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并更加注重质性评价方法的运用。在定量方面，可尝试设计针对跨文化敏感度、文化认同态度等方面的量表，进行教学前后的对比测量。在定性方面，则应成为评价的主力，深入分析学生的反思日志、项目报告、课堂讨论记录、深度访谈转录文本等材料，从中捕捉其思想观念、价值

判断与情感态度变化的痕迹。这种评价虽然耗时，但更能揭示教学改革对学生内在世界产生的深刻影响，为持续改进教学提供最宝贵的依据。

6. 结语

本研究立足于课程思政的时代背景与跨文化交际教学的内在需求，系统论证了二者在目标、内容及方法上的深度耦合关系，并据此构建了一个以“价值引领”为核心理念、以“能力重构”为实践目标的教学改革框架。该框架通过重构“价值-知识-案例”三维教学内容、创新“情境-反思-行动”三阶教学方法、改革过程性与多维度的综合评价体系，为跨文化交际教学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有机统一提供了具体路径。本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厘清了课程思政与专业教学融合的内在逻辑，更在实践层面为一线教师提供了可操作的行动方案，对推动外语类及相关人文课程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育人转型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当然，本研究提出的改革框架仍需在将来接受大规模、长周期的教学实证检验。后续研究可在以下方面继续深化：一是开展基于具体教学情境的行动研究，对本框架下的各项策略进行细化和效果验证；二是着力开发与之配套的典型案例库、活动方案及评价工具，以支撑更广泛的教学实践；三是探索构建跨校际的教师协作共同体，共享改革经验，共同推动跨文化交际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与创新发

参考文献：

[1] 文秋芳.大学外语课程思政的内涵和实施

框架[J].中国外语, 2021 (2): 12-17.

[2] 张红玲, 孙有中.跨文化交际学助推外语新文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外语界, 2024 (04): 2-9.

[3] 文秋芳.对“跨文化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思考: 课程思政视角[J].外语电化教学, 2022 (2): 3-8.

[4] 仰少博.高校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建设探索研究[J].河南教育(高教), 2025 (12).

[5] 吴远青.课程思政视域下“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路径探索[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24 (03): 35-44.

[6] 杨本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高校外语人才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探析——评《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训》[J].教育发展研究, 2025, 45 (18).

[7] 何永成, 童芳莉.跨文化交际课程思政实践探索: “全球—国家—地方能动”视域[J].外语界, 2025 (05): 91-96.

[8] 祝一舒.人工智能时代大学法语教学中跨文化交际能力培养路径探索[J].山东外语教学, 2025, 46 (06): 65-74.

[9] 何宁, 王守仁.人工智能时代“新外语”建设的目标与路径[J].外语界, 2025 (02): 11-15.

[10] 王欣, 陈凡, 石坚.价值引领下的英语专业课程群思政建设[J].中国外语, 2021 (2): 4-11.

[11] 张文霞, 赵华敏, 胡杰辉.大学外语教师课程思政教学能力现状及发展需求研究[J].外语界, 2022 (3): 12-19.